

2019 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 与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

编者按:美国经济学联合会(AEA)官方网站于 2019 年 4 月公告,授予奥利弗·哈特、爱德华·拉齐尔、阿里尔·佩克斯、玛格丽特·斯莱德等 4 位美国经济学家 2019 年度杰出会士奖(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授予日裔美国经济学家中村惠美 2019 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现将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相关颂词编译如下。

2019 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

奥利弗·哈特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自 1993 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目前是哈佛大学安德鲁·富雷尔(Andrew E. Furer)经济学讲席教授。他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深入且实用的杰出贡献。他的成果不仅启发了许多理论研究,还深刻影响了公司金融、劳动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法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实证研究。他关于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研究(主要与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合作),为代理人在委托人不知晓行动情境下的两主体间的契约订立构建了模型。这些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哈特的研究塑造了人们对于激励和计件合约的认知。在公司金融领域,他的成果为高管薪酬中期权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同样是与桑福德·格罗斯曼合作,哈特构建了公司治理的基础模型。例如,一份股权为何通常对应一票投票权。这些模型不仅加深了学界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理解(例如收购竞赛中为何股东会拒不合作),也是监管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基础,甚至适用于解释在公司治理较为薄弱的国家中出现的复杂公司治理结构(例如金字塔结构)。

在与桑福德·格罗斯曼和约翰·穆尔(John Moore)等分别合作的系列论文中,哈特对解答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基本问题:企业为何存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工作最早把契约不完全的想法正式表述出来;无论是出于问题的复杂性还是因为缺乏远见,人们无法在一开始就把雇佣关系的所有方面写进契约。因此,除去最简单的情形,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要使契约有效,必须指定一个剩余索取者,即掌握控制权的人。这一概念巧妙地将所有权定义为控制权,并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

哈特没有止步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基于行为科学中“偏好依赖于参考点”的基本结论,探讨了被称为“企业行为基础”的课题。他持续进化的思想展现了他不断尝试攻克那些重要且有深度的问题,直至找到简洁、可靠且实用的模型来解释。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这部分成果深刻影响着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实证和理论问题,将学界的关注点从市场结果拓展到企业与机构的结构及其影响上来。

因对契约理论的重大贡献,哈特与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öm)一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特是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金融学联合会会

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多个荣誉学位。他曾任美国法经济学联合会会长、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哈特于 1974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爱德华·拉齐尔

爱德华·拉齐尔(Edward Lazear)在其富有创新且多产的学术生涯中,一直专注于分析劳动力市场中员工和雇主行为。他 1979 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PE)上的论文《为什么有强制性退休?》是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先驱之作,这篇论文解释了为何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会出现强制性退休规定,这是延期报酬激励机制的副产品。在 1981 年与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合作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作为最优劳动契约的锦标赛制度》中,他解释了为何在难以衡量员工的努力程度时,雇主有时会选择用锦标赛方法(tournaments)而非计件工资来激励员工。拉齐尔教授在以下研究主题发表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员工薪酬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政府关于歧视的政策、平权法案和可比价值的政策方针,教育政策,失业问题,文化、语言和多样性问题,自由雇佣原则,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以及关于定价政策和市场营销政策等。他发表了一百余篇论文和 11 本著作。

他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帮助建立了“人事管理经济学”这一劳动经济学的分支领域。这一劳动经济学子领域关注雇佣安排以激励员工提高生产力,并引导员工在大型机构中高效合作。他的著作《人事管理经济学》于 1995 年被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其 1993 年收录在维克塞尔讲座(Wicksell Lectures)系列的作品,总结了其在人事管理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该书是人事管理经济学入门级学者的必读书目,采用非技术性的通俗语言对拉齐尔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进行了综述。

拉齐尔于 2004 年获 IZA 劳动经济学奖,意味着他对劳动经济学尤其是人事管理经济学领域所做的重大贡献得到了国际认可。2006 年 6 月拉齐尔被劳动经济学家学会授予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奖,以表彰其对这一领域的毕生贡献。拉齐尔在 2006—2009 年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是《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的创刊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国家经济研究局特约研究员,曾任劳动经济学家学会会长。

拉齐尔教授自 1985 年起任胡佛研究所莫里斯·阿诺德/诺娜·琼·考克斯(Morris Arnold and Nona Jean Cox)席位高级研究员,1992 年起执教于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目前任戴维斯家族(Davies Family)经济学讲席教授。他此前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拉齐尔教授出生于 1948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图斯长大,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获得文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阿里尔·佩克斯

阿里尔·佩克斯(Ariel Pakes)对于产业组织实证研究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合作者提出了生产函数和需求系统估计,企业和产业动态分析的新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电信、汽车、医疗卫生等重要的经济学领域,从而评估政策变动的影响。

在他的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远程通讯设备产业中的生产率动态分析》中,佩克斯及其合作者奥利(Olley)设计了一种新方法来自估计生产函数并推断生产率,其基本思想是,企业的投资包含了关于企业生产率的信息,在该论文做出清晰说明的特定假设下,这些信息可被用于构建生产率的替代指标。这篇论文对生产率估计的大量文献有启发作用,且对实证文献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评估政策变动(例如放宽管制、贸易自由化等)对于企业和产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其被引次数第二高的论文《市场均衡中的汽车价格》中,佩克斯与合作者贝里(Berry)和莱文森(Levinsohn)提出了一种用于估计差异化产品需求的方法,这种方法解决了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了灵活的替代模式。这篇论文在学术界和反垄断部门的差异化产品市场建模和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佩克斯在企业 and 产业动态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影响深远。他与埃里克森(Ericson)合作的论文《马尔科夫完美的产业动态分析:实证研究框架》是学术界的经典。这一论文提出的建模框架成为

众多实证研究的基石,其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佩克斯对于电信产业生产率的动态分析。在《专利作为期权:持有欧式专利的若干价值估计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并求解了关于专利持有的最优停时问题(stopping problem),模型推导了其对总体行为的影响,并展示了基于总体数据如何估计模型参数。这篇论文于1988年获得了计量经济学会颁发的弗里施(Frisch Medal)奖章。

佩克斯也曾致力于构建更准确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以及分析医院中医生分配的激励机制。

除产业组织以外,佩克斯提出的方法在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医疗卫生、环境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领域也得到了应用,并为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所采用。他担任过数十名博士生的导师,这些学生中已有几位在顶尖学术机构担任教职。

阿里尔·佩克斯目前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托马斯(Thomas)讲席教授,并曾获诸多荣誉和奖项。除获弗里施奖章之外,他于1988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200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2017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为产业组织协会杰出会士。他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获得让-雅克·拉丰奖和BBVA基金会前沿知识奖。

玛格丽特·斯莱德

玛格丽特·斯莱德(Margaret E. Slade)曾作为数学家就职于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此后,她成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在市场和企业合作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产业组织经济学几乎都是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斯莱德和为数不多的学者为产业组织实证研究的复兴铺平了道路。相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证研究,在斯莱德的研究成果中,理论与实证部分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些研究建立了详尽的、通常是专有的数据集,这也形成了当今产业组织实证研究的典型特征。斯莱德扩大了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产业组织理论工具应用于此前未能被关注的市场,特别是非制造业企业。斯莱德自从就职于政府部门工作时起,就将其研究扎根于市场现实。她的成果详尽地刻画了市场制度的细节、影响市场的公共政策等。

斯莱德的大部分研究聚焦于自然资源和零售市场,以及垂直产业链中相关企业间的关联。无论是研究自然资源产品定价问题,汽油零售中的超级博弈策略,还是企业的垂直关联,她都致力于加强理论和实证、或计量模型之间的联系,最终目标是找出特定的参数,据此识别给定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而得出企业行为和公共政策职能方面的结论。

近年来,她的研究兴趣转向开发空间数据的分析工具,见其2002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刊》(*Econometrica*)的论文《空间价格竞争:半参数方法》和2007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Econometrics*)的论文《内生区位中心极限定理与复杂空间交互作用》。

斯莱德的这些贡献将在未来许多年间持续影响学界对于企业和市场的交互作用的研究。

斯莱德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现为该校荣休教授,并于2002—2007年间担任华威大学首任利弗休姆(Leverhulme)产业经济学讲席教授。她也是加拿大经济学联合会会士,曾任欧洲产业经济研究联合会会长,获得了基拉姆研究奖(Killam Research Prize),并获得赫尔辛基经济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玛格丽特·斯莱德由于其重要且原创性的工作,值得授予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称号。

2019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

中村惠美

中村惠美(Emi Nakamura)是一位实证宏观经济学家,她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厂商定价行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等问题的理解。她的独特研究方法以创造性地使用新的数据处理宏观经济学中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而闻名。在她之前,实证宏观经济学处理这些问题的绝大多数研究都使用二战之后的季度加总时间序列数据,与这些数据相比,她使用的数据集加总更少、

频率更高或扩展到更长的历史时期。她的研究需要对之前未被开发利用的数据进行艰苦的分析,这同时表明她对于能够用这些数据区分的各种备选理论模型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

中村最著名的研究是,使用个体产品价格的微观经济数据去验证宏观经济文献中使用的厂商定价模型的有效性。对于分析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这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关于个体产品价格调整的研究,特别是测度个体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平均时间长度,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价格刚性的关键证据来源。然而直到最近,大多数此类证据都来自对极个别市场的研究,其主要局限在于这些特定产品的价格究竟有多少代表性不能确定。不过在过去的 15 年中,跟踪庞大数量商品价格变化的新数据集的使用,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村和她的长期合作者约恩·斯泰森(Jón Steins-son)在这一研究进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在其引用率最高的《关于价格的五个典型事实:对菜单成本模型的再评估》(QJE, 2008)一文中,中村和斯泰森研究了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用于构造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个体产品价格数据,发现了个体产品价格变化的各种典型事实,这些典型事实可以与菜单成本模型这一广泛使用的价格调整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他们特别关注价格变动的平均频率,这一参数对于用来分析货币政策效果的量化模型的数值校准非常重要。虽然使用其他数据的已有研究一致认为,在美国经济中,价格变动周期的中位数接近一年,但是,马克·比尔斯和皮特·克莱诺(Mark Bils & Pete Klenow)首次使用 BLS 微观数据的研究却发现,用于统计 CPI 的 BLS 微观数据显示,在现实经济中价格变动其实更加频繁(价格持续期的中位数略小于 4 个月)。实际上,比尔斯和克莱诺并未使用 BLS 的微观数据,只是从中抽取了 1995—1997 年间、在一个极细分类层次上报告了价格变动平均频率的数据。而中村和斯泰森使用了 BLS 的微观数据,包括 BLS 收集的所有价格观测数据,时间范围为 1988—2005 年间。

使用其更具优势的数据集重新讨论比尔斯和克莱诺的结论,中村和斯泰森发现,关于 CPI 数据中价格变动频率的结论取决于区分正常价格(regular prices)变动与由促销导致的价格变动的方法。他们也研究了个体产品批发价格和消费价格的变动。研究发现,与包含促销的价格变动相比,正常价格变动的频率更低(正常价格的持续期中位数是 8~11 个月,取决于对价格变动进行分类的具体方法)。而且,生产者价格变动的频率也很低(生产者价格不太需要过滤促销因素)。这篇论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首要原因是,与比尔斯和克莱诺令人吃惊的结果相比,其给出了个体产品价格粘性的非常令人信服的、更具实质性的微观证据。对于归纳能够用于检验某一特定价格调整模型是否与现实吻合的个体产品价格变动特征,这篇论文也很有价值。中村和斯泰森强调了两个与广泛使用的价格调整模型(菜单成本模型,或称为 S-s 模型)的预测相反的数据特征:价格调整频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价格变动的风险函数(hazard function)不是距离上一次价格调整的时间间隔的增函数。

在另一篇论文《多部门菜单成本模型中的货币非中性》(QJE, 2010)之中,中村和斯泰森研究了菜单成本模型解释微观价格变动特征的能力。以往对菜单成本模型的量化分析,比如戈洛索夫和卢卡斯(Golosov & Lucas)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假设经济中所有商品的价格调整都面临相同规模的菜单成本(除了假设所有商品具有相同的生产技术之外),并设定相同的参数取值来匹配所有商品价格变动的统计特征(比如价格变动的总体频率和平均绝对幅度)。但是,“五个事实”一文揭示的典型事实是,在美国经济中,非促销价格变动的频率具有很强的部门异质性。

“货币非中性”一文校准了一个多部门菜单成本模型,以匹配所有商品的价格变动频率和价格变动平均规模的部门分布特征。作者发现,在其多部门模型中,货币扰动的真实效果是戈洛索夫和卢卡斯这类根据平均价格变动频率校准的单部门模型的三倍。实际上,戈洛索夫和卢卡斯认为价格粘性不是货币扰动产生实际效果的合理的实证解释。中村和斯泰森则表明,如果考虑价格调整频率的微观证据,当按美国经济的实际观测校准名义冲击的量级校准时,他们校准的多部门模型预测名义冲击造成的产出波动占美国经济产出波动的 1/4 左右。这一结论与采用实证 VAR 模型分析货币扰动导致的产出波动份额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当。

最近,中村和斯泰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将 BLS 消费价格的微观数据集拓展到 1977 年。这个劳动强度很大、持续多年的数据库建设项目很有吸引力,因为扩展的数据库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这段时期。与 1988 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相比,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率更高、波动更大。使用这个拓展数据集的第一篇论文是他们与帕特里克·孙(Patrick Sun)和丹尼尔·维勒(Daniel Villar)合作的《难以捉摸的通货膨胀成本:美国大通胀时期的价格离散》(QJE,即将发表)一文。这篇论文分析了,在一个通货膨胀率更高的经济中,厂商如何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调整产品价格。作者发现,在其数据集的早期(通货膨胀率较高),正常价格的变动(即剔除促销因素)更加频繁,而且在数量上与考虑厂家调整价格的固定成本(即菜单成本)的最优价格调整模型的预测相当。他们据此得出结论,在评估永久性选择一个更高通货膨胀率所导致的福利成本时,需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在通货膨胀率更高的环境中,价格更易远离当前市场条件下的最优水平,从而价格调整频率预计会上升。

这篇论文也试图测度在一个通货膨胀率更高的经济中,同类产品的价格离散度(price dispersion)会提高到什么程度。一些常用的价格调整模型认为价格离散度会更高:假定厂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考虑重新定价,厂商选择的最优价格会取决于每周的价格上涨速度。如果是这样,这将是在一个通货膨胀率更高的经济中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上升的重要原因。测度完全同质商品的价格离散度是很困难的,因为不同厂商产品价格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产品的异质性。所以,即使价格可以完全灵活调整,不同厂商的产品依然具有不同的价格。

由于这个原因,作者建议观察价格变动的平均幅度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和低通货膨胀时期的差异。其想法是,无论何时,只要进行价格调整,厂商都会将价格调整到当前的最优水平,则观察到的价格调整幅度就能表明调整之前价格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他们发现,当进行价格调整时,价格调整的平均幅度(平均上涨 7%)在 1988 年之前的样本期和 1988 年之后的样本期是大致相同的。他们将这个结果看作为,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厂商内生选择价格调整的时机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的扭曲的证据。如果价格调整的时机选择与一个厂商的产品价格偏离当前市场条件的程度无关,则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扭曲。作者认为,长期更高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福利成本可能不像基于价格调整频率外生假设的粘性价格模型计算的那么大。同时,对于通货膨胀成本的政策争论,对于理解美国历史上价格调整的典型事实,对于评估各种价格调整模型的实证有效性,这篇论文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府支出冲击的效果这一研究领域,中村惠美的研究也很有影响。各国政府广泛采用财政刺激措施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使得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中的这个经典问题重新产生了兴趣。但政府支出乘数的估计值很不一致,仍然很有争议。中村和斯泰森的论文《货币联盟中的财政刺激:来自美国各地区的证据》(AER, 2014),使用新的数据和新的识别方法研究了这个问题。

估计财政支出乘数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很难发现政府支出真正外生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认为军事支出的变化可以被视为外生的政府支出变化。然而,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加总的军事支出就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加总的军事支出对于识别过去 50 年美国经济的政府支出乘数没有什么作用。中村和斯泰森的论文的一个重要见解是,虽然总量上美国的军事支出可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各地区的军事支出一直变化很大,这些地区军事支出的变化可以用来估计政府支出乘数。已有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根据标准的理论,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很可能取决于货币政策的反应。一些研究者认为,政府为了应对深度衰退会增加支出,但是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的产出增长通常会引起货币政策紧缩,而货币政策紧缩会抑制产出的增长。通常的研究因为忽略了这一因素,所以会低估政府支出乘数,尽管在深度衰退期,货币政策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中村和斯泰森的研究策略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所有的州,货币政策的反应是相同的,所以对于解释政府支出对产出影响的跨州差异,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估计政府支出乘数时,面临的另一个复杂问题是,乘数的大小取决于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

已有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中村和斯泰森的实证策略的优势是,地区军事支出的资金来源是联邦税收,所以收到一大笔军事支出的地区和没有收到军事支出的地区的税收结构没有差异。因此,考虑地区军事支出的变化并将之与地区产出变化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比以往研究更加可靠的政府支出乘数的估计。

这篇论文提供的不仅仅是测度政府支出乘数效应的巧妙工具。作者指出,测度一个州相对较高的政府支出对该州经济活动影响的乘数,不必与测度国家层面政府支出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的乘数相同,因为任何一个州的政府支出增加都会对其他州产生外溢效果(这对于应对衰退的“财政刺激”效果的争论是一个中心议题)。这些外溢不仅是因为,当一国经济不那么开放时,一州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对其他州供应商的购买增加;而且还因为,一州政府支出的相对增加不是来自该州居民税负的相对增加,而增加国家层面的政府支出需要增加所有美国纳税人的税负。中村和斯泰森通过一个量化的多地区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个乘数之间的差异,在对模型参数赋值使其能够解释估计的州政府支出乘数的条件下,研究国家层面的政府支出乘数有多大。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将非结构化的实证研究与考虑实证估计结果的模型分析结合起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应用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村对于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与斯泰森合作的论文《货币政策非中性的高频识别:信息效应》(QJE, 2018)研究了,从 2000 年 1 月到 2014 年 3 月间,106 项美联储公告公布的 30 分钟内利率的变化。相关文献通常将这 30 分钟内观察到的金融市场的变化归因于美联储公告中公布的信息。然而,不像货币政策冲击的高频识别的早期支持者那样,中村与斯泰森承认,公布的信息不一定只代表在给定经济基本面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预期变化,还包含了美联储知道但是市场可能还不知道的经济状况的信息,或者美联储对当期经济状况的解释与公告之前市场对当期经济状况的解释不同的信息。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在允许这种信息效应可能存在的条件下,研究货币政策的非中性,建立并估计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能够解释观测到的美联储公告的效果。

这个问题促进了一类模型的发展,在这类模型中,美联储公告既有信息效应也包含纯粹的货币政策冲击,而且利用这类模型可以估计在观测到的美联储公告中这两种效应分别有多大。他们的估计结果表明,这类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观测到的美联储公告冲击的效果,即 2/3 的美联储公告冲击代表有关未来经济基本面的信息,只有 1/3 的美联储公告冲击是纯粹的货币政策冲击。而且,尽管信息效应非常重要,观测到的对美联储公告的反应与美国经济货币政策的高度非中性是一致的。这些结论对于货币经济学的重大基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对现有方法的重大改进。

虽然中村最具特色的贡献是实证研究,但是她的研究总是以对理论模型结构的透彻理解为指导,而且她的一些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中村、斯泰森与阿利斯代尔·麦凯(Alisdair McKay)合著的论文《重新审视前瞻性指引的力量》(AER, 2016)。这篇论文讨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货币政策问题,即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对当前经济危机做出反应时,中央银行对未来政策的承诺程度(可能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利率都保持目前的水平)是影响金融条件和刺激总需求的一种有效方式,即使当前的短期利率水平不变。

简单的新凯恩斯主义 DSGE 模型意味着未来维持高度宽松政策的预先承诺具有实质性的刺激作用。但实际上,在承诺将低利率延续到未来几年的条件下,这些模型预测货币政策会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大到难以将其视为实事求是的预测。这肯定与前瞻性指引较为温和的实际效果不一致,被称之为“前瞻性指引之谜”(forward guidance puzzle)。中村及其合作者认为,简单新凯恩斯模型的结论与现实不符,源于每个代理人都有单一跨期预算约束这一特征,而该特征又源于完全金融市场和没有信贷约束的假设。他们在一个允许存在不可保险的收入风险和信贷约束的模型中,分析了固定名义利率的长期承诺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短期内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与这些简单模型的预测相似,但是固定名义利率的长期承诺的预期效果要弱得多。而且,如果一个家庭很可能在接下来几个季度中的某个时点具有紧的借贷约束,那么关于比这个时点

更遥远的将来的货币政策预期对当前的支出能力没有影响,这极大降低了未来政策承诺对当前总需求的预计影响。

他们的替代模型意味着,对于摆脱急剧紧缩,前瞻性指引并不像简单模型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前瞻性指引是无紧要的。本文既有对重要政策辩论的贡献,也有对应用新凯恩斯模型评估备选货币政策的方法论上的贡献。它激发了“异质性代理人新凯恩斯模型”(heterogeneous-agent New Keynesian models)这支近期很活跃的文献,这支文献探讨了引入收入异质性和借贷约束之后的宏观经济动态学。

最近中村与斯泰森合作在《经济展望期刊》(JEP)上发表了《宏观经济学中的识别》一文,并撰写了一篇相关工作论文,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女性劳动力参与在衰退的缓慢复苏中的作用。前者是对在上文提及的财政政策论文和厂商定价论文中讨论的研究方法的推广:使用横截面上的变化来识别宏观经济现象,并以这些微观实证结论约束加总的结构模型。这种方法在中村最有影响的几篇论文中很常用,是方法论折中主义。它利用新的、更大的数据集的优势去探索横截面上的变化,同时也承认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带来她所感兴趣的关于宏观经济的结论。关于宏观经济的结论,需要在考虑微观数据中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对加总变量建立模型并考虑一般均衡。而且,宏观经济模型应具有可检验的横截面上的含义,能够提供额外的条件和能力来区分竞争性的宏观经济假设。这种方法也被用于她最近关于住房的财富效应的论文中,该文通过只聚焦于微观数据来提供明显不同的含义。

中村与福井(Fukui)、斯泰森合著的关于从经济衰退中缓慢复苏的工作论文《女性、财富效应和缓慢复苏》指出,缓慢复苏现象是与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向男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收敛同时发生的。这就是说,在20世纪中后期,当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上升时,随着女性在复苏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加,就业迅速从衰退中恢复。然而,当女性劳动力参与度上升并向男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收敛时,这种恢复变慢了。该论文认为,仅这一影响就能解释70%的经济复苏放缓。这是劳动力市场上发现的一个有趣的“对等现象”(opposite number):厂商在衰退中调整更快,因为厂商在解雇员工时进行更多调整以适应长期趋势。这一结论表明,在经济好转时会有类似的发现,因为厂商有能力吸引新的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此前,对中村学术成就的认可包括: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就奖(A Career Award from the NSF),2014年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2014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伊莱恩·贝内特研究奖(Elaine Bennett Research Prize from the AEA),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选的“下一代:45岁以下的25位顶级经济学家”之一,2018年《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评选的“十年来八位顶级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她是《美国经济评论》(AER)的联合主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顾问小组成员,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国民统计委员会成员,美国劳工统计局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些任命说明,作为数据构建问题的专家,她在该专业领域中迅速获得了认可。中村惠美对于实证宏观经济学一般方法论上的贡献,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领域的奠基性贡献,使她成为本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杰出候选人。

(“杰出会士”颂词由中央财经大学刘轶芳、龙彦宇译,“克拉克奖”颂词由武汉大学侯成琪译)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刘洪愧)